

汉代信息发布手段探析

黄春平

摘要：简牍作为信息载体而存在前后至少有千年之久。在简牍流行的汉代，官方传播系统中的一些文书内容有时需要公之于众，在没有现今发达的通信系统的情况下，这些文书信息是如何宣之于众的？结合史籍和简牍资料的考证，发现当时有书壁、挂壁、宣讲、传阅等四种基本信息发布手段。这四种手段在当时使用最多，也最为常见，帝国政府利用它们宣达诏令、公布政策法规，从而实现了朝政信息的上传下达，维护了其集权统治。

关键词：汉代；信息；发布手段

作者简介：黄春平，男，副教授，博士后。（深圳大学 传媒与文化研究中心，广东 深圳，518060）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 (2011) 03-0007-05

简牍作为中国的文字载体，早在商周时代就已经出现，到战国时期已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东汉以后尽管新的书写材料纸开始出现，但它的全面推广从而使简牍绝迹则是在公元四世纪左右，也就是说直到晋代以后简牍才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这样，作为信息载体的简牍其流行前后长达千余年之久。

简牍时代，并没有广播、电视、报纸等纸质或电子手段来进行信息的宣传和发布，当时官方是通过什么传播手段来将笨重不便的简牍所载的内容公之于众的？本文试图以汉代为例，对其基本的传播手段进行描述。

其实汉代并没有我们当今传播媒介的观念和概念，当时上自皇帝，下至各级官吏，为了实现对帝国的治理，都经常需要发布各类让公众知道和了解的法令、规章、通告、条律等，这些内容非常重要，大至朝代的更迭，年号的改元，叛乱的平定，小至一县一乡的告谕，均需要让臣民知道。所以一般都在下达的文书中特别注明：“布告天下，咸使闻知”、“露布天下”、“写移檄到，具写檄扁口亭隧高显处，令吏卒明”等等，要求公开化传播，以将信息公之于众。

我们以文书中这些特别性的标注为线索，结合有关史料，考察发现汉代常用的信息公开手段有四种：书壁、挂壁、宣讲、传阅等等。它们在当时的使用频率非常之高，传播影响也非常之大。正是公开化传播的特点才使它们具备了早期传播媒介的特质，成为当时政府沟通上下的重要传播手段。问题是这些不同类型的传播手段在当时是如何将信息公之于众的？下面分别予以述之。

一、书壁（题壁）

将信息书写于街亭显要处的墙壁或门壁之上进行公开发布，即书壁，也叫题壁，它是汉代诏令布告的公开发布方式之一。甘肃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四时月令诏条》是保存至今的汉代题壁的最好实物例证。

敦煌悬泉置是西汉河西要道上一家集传递邮件、传达命令、接待宾客为一体的驿置机构，也是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这封诏书是西汉平帝时太皇太后发布的一项诏文，它是安汉公王莽奏请和逐级下达给群众的文书。文书的主体部分是月令五十条，主要围绕保护生态环境规定了四季的不同禁忌和须注意的事项。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一部关于环境保护的法规。诏书当时就题写于驿置的墙壁上，

借以公之于众。

除了上面的实物《四时月令诏条》外,《御览·卷五九三》引《风俗通》佚文还记载:“光武中兴以来,五曹诏书题乡亭壁,岁补正,多有阙误。”

由“五曹诏书题乡亭壁”这条史料可以知道,到汉光武时期的诏书还存在着题写于亭壁之上的情况。

实际上,有时对廉价的简牍弃而不用,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就只能将布告文字直接书写于门壁之上,这就是书壁。上述记载的是东汉光武以来,当时很多的诏书一般都直接题于乡亭里壁之上或闹市之中,但它后来改为先书于木板,然后再张挂。据姚福申先生的研究,到了唐代还有将诏令抄录书写在大版上,然后还有“当村坊要路榜示”^{[1](23)}的情况。

大门、城门、桥梁、乡亭、烽燧等显要之处的墙壁或门壁都是书壁时信息的发布场所。

除了发布诏令之外,书壁还用于地方官府或军队发布告谕。出土汉简中出现的“扁书乡亭市里高显处”很多情况下就是发布一般的军事文告。这里的“扁书”,历史学家陈盘深有研究。他认为“扁”有两义,其中一义是这样解释的^{[2](95)}:

《说文 册部》:扁,署也。(段玉裁注:署者,部署,有所网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段玉裁注:署门户者,秦书八体,六曰署书。萧子良云:汉高六年,萧何所定,以题苍龙白虎二阙)。

这里陈指出了扁书的含义之一是题字于门户之上,即一般所说的书壁。

地方政府也用书壁来公布法令法规。史载东汉的王景为庐江太守时,他注意发展地方经济,训令百姓蚕织,制订法令制度,“皆著于乡亭,庐江传其文辞”(《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王景传》),即将这些法令制度写于乡亭之壁上,公之于民。乡亭之处,人多密集,所以能取得“庐江传其文辞”的良好宣传效果。

以上情况多限于官方朝政消息的发布。事实上,当时的起义军也善于运用这种手段来发布信息。东汉末年黄巾起义时张角为鼓动群众进行起义宣传,“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后汉书·卷七一·皇甫嵩传》),即用白土将“甲子”二字书写于京城以及州郡官府的大门上面。其目的是通过这样的宣传告知天下百姓,“甲子岁”将有“大吉”之事,到时会“黄天当立”。这里张角借题壁以制造舆论声势,动摇天下人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的书壁还被用于民意上达。“诽谤之木”是古代民意的一种传达机制,它始自尧舜时期,汉代还有这种情况。东汉应劭曾对此阐释:“至秦去之,今乃复施”(《两汉博闻·谤木》),即秦代取消了这种书政治得失于桥梁边板的制度,到汉代又重新恢复了这种制度。书写政治得失于桥板,意在表达意见、下情上达。

二、挂壁(悬书)

将文字书于木版、简册或缣帛之上,再将其悬挂于显要处,这种信息传播手段称为挂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简牍或缣帛用于书写,公之于众,只能悬挂,所以叫挂壁,俗称悬书。

挂壁也是汉代诏令布告的公开发布方式之一。

《御览·卷五九三》引《风俗通》佚文明确记载:“(顺帝)永建中,兖州刺史过翔笺撰卷别,改着板上,一劳而久逸。”这条史料中的“改着板上”中的“板”即“扁”。即由原来的书诏令于壁改为后来的书于板牍,再加以悬挂。这属于典型的“悬书”。至于如何“悬”,历史学家陈盘解释得很清楚:“……简册之文县于门户者,皆可以扁称之。上引汉简之所谓扁是也。”^{[2](95)}其大意是将字书于木版或简册之上,再将其挂于显要处,即谓扁。这种扁就是悬书。

此外,东汉后期政论家崔寔在《政论》中说:“里语云: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这表明东汉时期地方官的文书,已超过皇帝诏书的力量。这里的“挂壁”虽然有夸张之嫌,但据此可知

当时的诏令还有先抄录于扁然后再挂于壁的情况。

汉代还用悬书（挂壁）来公布法令制度。

挂壁用于公布法令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天官·大宰》（“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悬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和《周礼·秋官·司寇》（“皆以木铎徇之于朝，书而县于门闾”），它是最古老的一种法令公布方式。将官法书于版或帛而悬于宫廷的门阙或里巷之门，以让吏民熟知。

到汉代，还有这种传统。《淮南子·卷十三·汜论》中有“天下县官法曰，发墓者诛，窃盗者刑”的记载。专门记载典章制度的《苏氏演义·卷上》记载：“县者，悬也，谓悬赋税户口法令以示于下民。”

法令的公布是非常严肃的事情。法令悬于阙观，当时过往之行人都要遵守一定的礼节。后汉时期有一个叫夜龙的男子曾经向兄夜阳要钱，因兄给的钱太少，夜龙想毁掉夜阳之家，于是故意“持弓矢射玄武东阙”，此事惊动朝廷各级部门。应劭时为太尉议曹掾，曾因此事向当时的宰相邓盛提出处理意见时说：“夫礼设阙观，所以饰门，章于至尊，悬诸象魏，示民礼法也。故车过者下，步过者趋。今龙乃敢射阙，意慢事丑，次于大逆，宜遣主者参问变状。”（《后汉书·卷一〇七·五行志五·射妖条》引《风俗通》）这里应劭谈到汉代的象魏并对其进行了说明，指出“象魏”的主要功能在于“示民礼法”。所以过往之行人都要求做到“故车过者下，步过者趋”。由此可见当时法令公布的庄严性。

此外，挂壁还可用作普通的告示来彰恶扬善。《后汉书》载，永元十五年，王涣为洛阳令。所治洛阳政平讼理，发擿奸伏。被京师称叹他有神算之能。他去世后，民思其德，为他立祠安阳亭西。乐府诗《雁门太守行》称赞了其治绩功德。其中有“移恶子姓，篇着里端”句，“篇着里端”中的“篇”，《说文》是这样解释的：“篇，书也，……谓书于简册可编者也。”据此可知其大意是洛阳令将横行不法者的姓名书写于简册，公布于里门上端醒目之处。

类似的情况《汉书》还有记载：“悬于都市，编书其罪”（《汉书·卷七七·诸葛丰传》）。唐代颜师古的解释是：“编谓联次简牍也”，意思是将其罪名写于简牍上面。然后连同尸首一起悬于都市以示众，使四方之人知道为恶所得到的惩罚。这里的信息很可能是以悬书的方式公之于众的。此两例都是以悬书来昭示恶行，警示百姓。

挂壁除了彰恶之外，还可用于扬善。其中“扁表”最为典型，它是一种将文字写于木牍然后公之于众的信息发布方式。东汉许慎的《说文》是这样释“扁”的：“署也，从户册；户册者，署门户之文也。”其大意是将简册之文悬于门户。在封建社会，那些维护和遵守封建伦理道德、政治规范政绩显著者，多被赏以匾额，称“扁表”（《后汉书·卷一一八·百官五》）。获得官府或百姓的扁表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这种“扁表”也以“挂壁”的方式出现。

三、宣 讲

宣讲，即由政府派官吏向民众口头宣布、讲解或讽读。宣讲这种方式主要用于诏令、朝廷及地方政府律令或制度的宣布、传达与解释。

宣讲的内容多以诏令为主。当时西汉的颍川太守黄霸做得最有特色。他“以宣布诏令治民”，当时在其所治之处出现了“道不拾遗，男女异路，狱中无重囚”的良好政绩。黄霸因此得到孝宣皇帝的封侯赐金之赏^[2]。

除了诏令之外，有时地方政府的制度与律令也以宣讲的方式来传布。东汉的陈蕃在上疏中曾建议朝廷选用有仁爱、清贤、奉公之心的官吏去班宣朝廷的法令政策，这样就可以根本不动用军队而使贼患弥息^[2]，可见宣讲的重要性。而宣讲人既有朝廷的专使来“宣扬国命”（即传达和宣讲朝廷的政令）（《后汉书·赵岐传》），也有刺史专门周行郡国“班宣”诏书（即刺史有时负责圣命的宣讲与传达。武帝时期曾专门设置部刺史十三人，周行郡国，“班宣诏书”^[3]）。有时太守甚至亲自奉宣诏书或组织专门的官吏深入百姓中间进行宣讲与传达。如济阴太守孟郁修尧庙碑^[1]，记载了孟郁奉行县到咸阳、奉宣

诏书的事迹。武都太守耿勋碑^[2]，也有奉宣诏书的相关记载。《汉书·卷八九·黄霸传》记载了太守黄霸特别注重奉宣好诏令，他专门选择良吏并设置父老、师帅、伍长这些最基层的小吏和士绅来颁行律令，分部“宣布”，劝化百姓。《史记·张耳陈余列传》载受到诏书追捕的张耳、陈余两位魏之名士变更名姓当着“里监门”的差使，并因此凭借着基层官吏——里正卫的身份免于追捕，反将追捕的诏令传达于里中。由此可见，在秦汉时代诏令类信息的宣布与传达甚至还可以由里正卫这类基层的小吏来专门负责。

为什么需要宣讲？以诏书为例，文景以前的诏令文书语言质朴，容易理解。到汉武帝时期由于崇尚儒术，所下诏令追求古奥^{[4](51)}。武帝时期的公孙弘曾经指出朝廷下达的诏书律令，大多是“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陋寡闻，根本看不懂，更不用提全面完整地按照旨意进行宣达，其结果是“无以明布谕下”，即不能清楚明白地布告于百姓^[3]。而东汉光武以后，诏令文书热衷于语言的雕琢，追求典雅之文风^{[4](53)}。正因为汉代的诏令类文书本身因行文的原因而可能存在着一定的理解难度，所以在下达和传布的过程中有时派专人到民众中进行宣读、讲解，这样才可能使诏令类的文书信息明白、清楚地传布于民众之中。

另外，很多时候宣讲也不排除宣传与灌输的目的。统治阶级为了实行教化，于是在信息的传布过程中派遣各级官吏深入民众之中进行解说、劝服与宣传，以让民众理解和接受官方的各种教化，沐浴皇帝的圣恩，从而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汉书·贾山传》载：“臣闻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羸癯疾，扶杖而往听之。愿少须臾毋死，思见德化之成也。”王褒《四子讲德论（并序）》具体地描述了刺史勤苦的“宣布诏书，劳来不怠”（《全汉文·卷四十二》）后百姓晓喻圣德、沐浴皇恩的情况，这里的“宣布诏书，劳来不怠”主要是指刺史宣读、讲解诏书，勤苦不懈，所以才有百姓“遍晓圣恩”的结果。

宣讲实际上是一种面对面的、一对多的人际传播。宣讲者要么是朝廷派遣的专使或刺史，要么是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太守本人以及太守委派的良吏，要么是专门负责民众教化的三老等基层官吏以及里正等小吏，他们大多有着官方的身份与权威，代表着官方的意志，是官方的喉舌。

四、传 阅

汉代尽管出现了纸张，但当时的纸还处于原始形态，并未广泛使用，而且缣帛贵重，所以当时的传播材料主要还是以简牍为主，这就决定了当时不可能像后来那样以印刷的方式对信息进行快速复制和广泛发行。但正是这种以简牍为传播材料的情况形成了当时的信息传播过程中特有的公开传阅制度。

公开传阅这种信息传播方式早在秦代已经出现。《睡虎地秦墓竹简·语书》载，秦始皇二十年（前227年）四月初二，南郡守腾发布了给各县道啬夫的文告，要求各县道将文告“以次传”，但对江陵则是“别书江陵布，以邮行。”其大意是将本文告的内容（“语书”）在各县依次传阅，而“江陵”地区单独邮行。

在汉代，文书简本身一般都有封泥槽，正常情况下在封印时都要将其捆束打结，如不用绳子捆结，“仅将封泥捺入封泥槽内，其上用印即可，这应是所谓的‘露布’文书”^{[5](16)}。这种露布文书“露版以宣众”，意在彰露、布告，将信息公开传播，通告各地^[6]。它们多以板檄、觚檄的方式传行公布，实际上是一种不缄封的公开传阅。

当时传阅的内容也比较普遍，从中央的诏令布告到边寨的军情通报，多采取这种方式。这方面的记载很多。汉简中见得最多的是“隧次行”的记载。如在瓦因托尼出土了一枚完整的檄书，属于觚檄，它分三个版面记载了十二月辛未甲渠候长候史和十二月壬申殄北候长候史以及甲渠燧长的敌情报告^[7]，都尉府根据敌情宣布在这个地区内施行戒严并进入战备状态，该觚之第二面上端有“广田以次传行至望远止回”，要求将该文书从殄北候官的广田燧传阅至望远燧。

据汪桂海的研究，“凡‘隧次行’者，多为露布，即需要公开传递的文书，逐隧传递，意在沿途传阅，寓传递与传阅两重性”^{[5](185)}。

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公开传阅有时还伴有“写传”的机制。即原发文机构往往“要求某处收到文

书后抄录一份，将抄件再传某处或依次再传数处”^{[8](125)}。传写一般按照行政级别由高到低逐层传抄，传抄时不加封缄，逐级转达。如《敦煌汉简释文》还载“获虏写传至斥地”（1540简）“广武写传至步昌陵胡以次行”（1809简），等等这种情况比较普遍。

写传过程中，下一级部门将上级的布告原件保存下来存档，而将其抄件再向下级部门传达，这就是汉简中多次出现的“写移书”，所谓写，即抄写、誊写。仿照正本誊写文书称写书。写移书是誊写后使之运行的文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传抄本^{[8](170)}。可以说明当时的很多文告都是以抄件的形式层层传递和发布。转抄能实现信息的上传下达，将信息传播到帝国各地。

五、结 语

综上所述，题壁和挂壁都是印刷媒介出现之前的一种书写传播。题壁是在非常规性的信息载体——壁上进行的，挂壁是书于简牍缣帛之上再悬挂于门（或墙）壁之上。壁的存在之处既可是城门、里门、桥梁、乡亭、市里，还可以是边境的亭隧等。它们多为公共场所，而且位置固定，材料坚固，以之为依托，可以在公共场所长时间地昭示信息，而且还可以长久保存信息。信息传布到题壁和挂壁之所，基本上实现了家喻户晓。

按照伊尼斯的媒介偏向理论，文字媒介倚重的是时间，它能流传久远。但它最大的缺点是在传播中受到空间的制约，只能在固定的场所进行传播。正因为以文字传播为主的题壁与挂壁存在着这样的缺陷，所以汉代还存在着另外一种能够跨越空间、破除传播场所局限性的信息发布手段，即口头宣讲和传阅，利用它们实现了传播场所的扩散，弥补了题壁与挂壁这两种信息发布方式的不足。

依赖如上的这些信息发布手段，汉帝国时期需要公开传播的各种文书内容才最终实现了公之于众。和我们今天的通信手段相比它们尽管非常原始，但在当时通过它们能将信息公开并大范围的传播和告知，因而算得上是简单、有效的传播手段。

一位美国传播学者认为，罗马帝国之所以能统治辽阔的疆域，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它有一个发达的、包括《每日纪闻》在内的信息传播系统；而罗马帝国的灭亡，也与其扩张过甚，传播系统跟不上去有关^{[9](4)}。

同样，汉帝国能统治辽阔的疆域达400年之久，也与其有一套完整的自上而下的文书传播系统有关。对此，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以“萧何入秦，收拾文书”为例，说明“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以文书御天下……”。可见东汉时人早就已经意识到文书传播系统在中央集权官僚体制制中的重要作用和独特意义。而在这个文书传播系统中一些特殊的文书如布告、檄文、露布、告谕等等都属于一种带有原始性质的大众传播媒介，它们借助上述发布手段最后完成了信息的公开传布，及时地实现了信息的下达。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上述信息发布手段是汉帝国政府与不同阶层联系的重要工具，正是它们的及时的公开化传达才使官方的统治触角从中央延伸到地方，从城市延伸到乡村，从而形成中央到地方的治理“网络”，实现了传播制度层面上的高度集权与统一，其历史意义相当重大。

参考文献：

- [1] 姚福申. 唐代新闻传播形式[A]. 学海泛舟二十年——对新闻学与编辑学的探索[C]. 香港: 香港语丝出版社, 2001.
- [2] 陈盘. 汉晋遗简识小七种“扁书”条[A].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三六六[C]. 1975.
- [3] 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居延新简上·甲渠候官[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 [4] 闵庚尧. 中国古代公文简史[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8.
- [5] 汪桂海. 汉代官文书制度[M]. 南宁: 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9.
- [6] 黄春平等. 论汉代露布[J]. 深圳大学学报, 2007(3): 152 - 158.
- [7] 徐苹芳. 居延、敦煌发现的《塞上蓬火品约》——兼释汉代的蓬火制度[J]. 考古, 1979(5): 445 - 454.
- [8] 李均明. 汉简所见“行书”文书述略[A]. 北京: 秦汉简牍论文集[C].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9.
- [9] 张隆栋. 外国新闻事业史简编[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